

# 历史唯物主义对“物”的多重透视

——关于《回到马克思》第二卷的访谈

张一兵 张义修

**摘要:**《回到马克思》第二卷提出“物相化”概念,系统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对“物”的多重透视,凸显物质生产和劳作过程中人的有目的、意向性的创制活动。第一层级物相化包含塑形/失形、构序/祛序、赋型/脱型等环节,以期深化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生活的微观化解释,并结合科技物相化等概念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凸显了劳动这一主体性线索,不仅丰富了对劳动物相化的论述,而且开启了狭义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第二层级经济物相化的新空间,揭示了劳动交换关系颠倒地表现为经济事物的复杂过程,也为重新说明事物化颠倒、拜物教批判、劳动异化批判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回到马克思》第二卷;历史唯物主义;物相化;事物化

**作者简介:**张一兵,哲学博士,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哲学学院博士生导师;

张义修,哲学博士,浙大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569(2026)01-0062-11

张义修: 张老师,您好!您在《回到马克思》第二卷(以下简称第二卷)中原创性地提出“物相化”概念,并对马克思思想中的“物”进行了系统阐释。在过去这些年里,是哪些思想契机促使您不断深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物”的思考?

张一兵: 孙伯鍈老师当年给我们上研究生课时就讲了一个观点:历史唯物主义的“物”是最难理解的。在传统的哲学唯物主义的体系中,“物”没有任何神秘感。但是,孙老师提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物”并不是实体,不是我们直观中看到的那个东西。这对我影响巨大。后来我在解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解释历史唯物主义时,也是按照这样一个基本思路。这一次,在第二卷里,这一问题又延伸到很多方面,包括《资本论》中的那句话,商品

是“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sinnlich übersinnliches Ding)。<sup>①</sup>我在第二卷下册中提到,经济物相化是孙老师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物’是最难理解的”更深的层次。这里包含一个跨度很大的变化。

物相化问题也是第二卷中很难理解的一个部分,是我在书稿修改过程中嵌入进去的。这个问题的背后是“社会关系场境存在论”,这是对我之前提出的“思想构境论”的奠基。2009年我在《哲学研究》发表了一篇文章,梳理阐释了构境论的一些基础概念。在第二卷中,我主要的对话者是海德格尔与广松涉。这两位对话者促使我在第二卷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时,在长时间思考的基础上提出“社会关系场境存在论”。广松涉提出了“关系本体论”,这跟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点是一致的,从这一角度观察马克思的思想,许多问题都会在新的层面上迎刃而解。海德格尔从马克思的关系视角进入,但没有停留在关系问题上。他否定了“关系”概念,因为他认为“关系”仍然是两个实体之间的联系,故转而采用德文词“Sorge”。我把它翻译为“关涉”,指主体作用于对象的介入性活动,这深刻体会到了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内涵。基于“社会关系场境存在论”及“思想构境论”这两个原创性的理论部分,第二卷在解释马克思时用“物相化”等概念替代了传统的概念。

在过去的哲学教科书里,我们比较多地讲“物质”,主要是对象性的实际存在。马克思从《提纲》开始,从感性直观的“物”穿透到背后的实践活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个问题是,马克思从来没有否认物质的客观存在。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中,自然唯物主义从来没有被简单否定掉,而是作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个前提。客观的自然物质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传统唯物主义把这种物质作为哲学本体论的基础,认为第一性的东西是物质存在,实存的物是最重要的、统一整个世界的基础。马克思在《提纲》中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是这样的,他从主体出发去理解物,而不是否定它的自然存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和恩格斯也提出“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die Priorität der äußeren Natur),<sup>②</sup>把它作为先在性的前提。但马克思的哲学思考不是从这一点出发的,要理解进入社会历史过程中的自然存在,或者我们遭遇的所有的物,都只能从主体出发、从活动出发。物本身被消解了,这不是因为物不存在,而是因为物的非现成性。

以一个杯子为例,海德格尔说,这是现成在手的一个对象,是“存在者”。但实际上,让杯子成为杯子的那个过程并不在场。杯子不是它自身。我们看到了杯子这个现成物,遗忘了让它成为杯子的“存在”。“存在者”与“存在”的差异,就是它的存在论的基础。这种思路从哪里来的?马克思的《提纲》。你看到一张桌子时,桌子不是它自身。为什么呢?从主体的实践活动出发,是原来的自然树木被采伐下来以后,经过劳动加工,成为桌子这个状态。让桌子成为桌子的不在场的东西,我称之为“相”,这是个存在论的概念。“相”不是主观假象,而是客观的;不是外部的、自然的物,而是被赋予一种特殊的存在方式的客观存在。

马克思在《提纲》中实现了双重透视。第一重是透过直观对象,看到让这个对象成为它自身的、不在场的“实践”。这一点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变成了“物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6页。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II/5,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83, S.44.

② 广松涉编注《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I/5, Text,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17, S.22.

我们在生活里遭遇的所有的感性对象,都是被实践作用过的结果,是从主体出发,让物按照人的需求,变成某种特定的状态。胡塞尔在解释本质直观时指出,所有的认知和意识活动都不是简单的反映。主体的认知和意识,核心本质是“意向性”。第二重透视是在人的生命过程背后透视到“关系”。活动造就了一种新的“关系”。海德格尔认为这不是“关系”,而是介入性的“关涉”,他用“在世之中”来替代关系概念。总之,从《回到马克思》第一卷到第二卷,在“物”的问题上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张义修:您在第二卷中提到“物相化”之“相”的哲学史内涵:相对于经验的杂多,“相”是事物背后的普遍性和本质;相对于质料,“相”是形式,是柏拉图哲学中的“理念”和“爱多斯”。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事物的质料因、形式因(Eidos)、目的因(Telos)和动力因,后三种可概括为形式因。您尤其强调,“相”的背后是主体的、有“目的”的创制活动。这似乎是对柏拉图以来的“共相”观的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强调人对物质原初状态的主体性重塑。

张一兵:对。在古希腊哲学里,我读书时最早读的一本是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传统欧洲哲学思想史中的范畴,主要都是从哪里来的。卢卡奇晚年也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把传统的哲学概念都拿进来,重新解释新的社会生活。在他的“社会存在本体论”中,讨论劳动的核心概念就是黑格尔的“目的”的设定。这个“目的”就是要实现出来的“爱多斯”。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讨论人通过劳作去作用于外部世界的时候,柏拉图用的是“理念”之“相”。这一思想的唯心主义本质在于,这个“相”是观念的“共相”。我上课时经常讲,所有的树是感性的、杂多的具体存在,而“树”这个概念是“一”,它把所有的树所共有的东西抽象真实出来。这在柏拉图那里被定义为“理念”。到了亚里士多德那里,有一个通过劳动实现的主观意图,被称为目的或者“爱多斯”,我在第二卷里反复使用这一概念。人有一个想法、一个意图、一个确定的目的,把它对象化到外部被改变的东西中,整个劳作过程就是如此。

过去我们讲劳动和生产的时候,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对象性”或者“对象化”。这两个概念讲的是,我们的一种想法变成东西。这个概念缺了什么?缺的是带着一种意图、目的、爱多斯,让对象发生改变。现成的“物”被打碎了,不是说现成的对象不存在,而是现成对象真实本身包含了不在场的、让它成为它自身的东西。“物相化”就是把希腊哲学一直到近现代哲学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联系起来,这也恰恰是马克思要说明的东西。我用它来说明人的整个生命存在、社会存在的基础,以此强调物质生产和劳作过程中人的有目的、意向性的介入。“物质生产”概念没有沿袭从古希腊哲学到黑格尔、胡塞尔的这一已经比较成熟的基本想法。卢卡奇为了维护劳动本体论而放弃“物质生产”概念,我跟他的看法不一样,我认为“物质生产”概念可以用更精准的方式来表达,所以提出了“物相化”。

张义修:您在第二卷中提出,黑格尔的“绝对观念-逻各斯”与柏拉图的“理念-共相”论属于同一学术构境谱系,进而影响了马克思对“物相化”的理解。而且,您首次提出,这尤其体现在青年马克思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摘录》中,马克思形成了一种“物不是它自身”的深刻透视。可否简要解说下黑格尔对马克思的这种影响?

张一兵:在黑格尔哲学中,物的问题被解析为“物相”和“物像”两个方面。“物不是它自身”首先表现为,自然物不是它自身,而是观念的异在表现形式,是绝对理念的沉沦和异化。在这个异化过程里,物是真实存在的、客观的,但不是它自身,因为它是被设定的。黑格尔说,意识设定了对象。你看到一个对象时,设定这个对象的意识是不在场的。这是第一种客观存在的“物

相”。第二种“物相”是被制作成的某种东西。物不是它自身,因为是观念的主体性注入对象的自然物质中。这两种“物相”都是在唯心主义观念本体论的意义上说的。

其次,当我们把这个物看成外部的物的时候,这是一种认识论上的“物像”。《精神现象学》就是要讲这个问题,你以为这是物,但是物不是它自身。你以为是它自身的那个“物像”,实际上是一个假象、幻象,是恰恰没有认知到本体论意义上的“物相”本身。所以第二卷提出,马克思“物相化”思考的起点并不是在《提纲》,而是在上册关于《精神现象学》笔记的部分,这给了马克思思考“物”以新的基础。第一个基础是实践唯物主义,第二个是历史唯物主义,第三个是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当中,他遭遇了一种新的物。

张义修:说到“物相”和“物像”的区分,在第二卷中,您把马克思超越物性直观的科学透视方法称为“非物像透视”。这些提法似乎是针对广松涉等日本学者的“物象化”概念。

张一兵:日本学术界在用“物象化”概念的时候,比较多的是受到胡塞尔影响。广松涉的“物象化”针对的是实体中心主义,他提出马克思是从“异化论”转变到“物象化论”,后者的核心是关系本体论。他跳过了“实践”环节。而在马克思那里,首先是实践活动,从活动才到关系。广松则是从异化问题一下子就到了关系本体论。他没有理解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一个观点,“物相”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客观存在,“物相化”意味着存在论层面的改变,“物像”则是主观认知的产物,是一种误认。一个是存在论,一个是认识论,广松混淆了这个界限。

广松还混淆了两种不同的“物象化”。马克思在《提纲》里讲的“物像”透视,的确是反对实体主义的实在论。但这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之后对经济“物像”的透视不是一回事。而广松把它们等同起来,即物象化论既是关系本体论,又是拜物教批判。我在第二卷中跟广松争论的一个核心点在于,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一个是透视一般性的实体“物像”;另一个是透视事物化颠倒和异化造成的经济“物像”,也就是拜物教。

张义修:接下来谈谈您在第二卷中提出的“物相化”的具体环节。第一层级物相化对应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确立的人类社会历史的起点,即物质生产活动,其本质是“人根据先在的意图(eidos,爱多斯——相)创制(poiesis)对象的劳动物相化过程”。您紧接着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塑形/失形、构序/祛序、赋型/脱型、构式/解构、筑模/消模、构境/破境),用这一系列新概念来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当代阐释,是想要传达怎样的信息?

张一兵:现在网上有人质疑我使用“黑话”,他们觉得,用原来的概念不都能说清楚吗?实际上,按照刚才我们开始的这个思路,是说不清楚的。比如讲生产问题,马克思抽象出来的、表达其本质的重要概念是“生产力”,它是生产的一种功能水平。再往后走一步是“怎样生产”的“生产方式”。这里最基础的问题是工艺学的劳作技能。劳作技能具体是干什么的?首先给予自然物一种它原来没有的形式,我用了一个词——“塑形”(shaping)。用卢卡奇举的例子,原始人制作石斧的过程,是把大块的石料慢慢削尖,把其中一面打薄。这就是给予一个“形式”,这个形式本身是自然界没有的。通过给予这个形式,人的目的实现了。用“物相化”来说,就是这个“相”进去了,这是通过一个外形来实现的。而马克思在工艺学笔记里突然发现,劳作的开端不是“塑形”,而是“失形”(disfigure)。原来的木头和石料都有其自然的存在形式,人的劳作的的第一步,是把它们原来的自然形式破坏掉,所以我用了“失形”概念。在这之后,才能给予它一种新的形式。所以“物相化”的那个目的(相)不是落在空中的,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它的最基础表现是给予形式。但是,制作石斧,“削尖”这个“形式”,是为了能够“砍伐”。这个“砍伐”不是

物自身的属性,而是人满足自己需求的功能性活动,它给予特定的自然存在物一种新的有序性,这就是“构序”(ordering)。

所以,我用了几个新概念,这些新概念把马克思原来在历史唯物主义讨论中的比较宏观的概念,微观化到非常具体的每一个部分:物质生产是怎么做的?劳动活动的过程是什么样的次序?比如一双鞋子,在静止状态下,放在柜子里面,那个鞋子是不是它自身?不是。鞋子只有在一种状态下才是鞋子,也就是当脚穿进去走路的时候。它的社会存在的质性就是被穿着。所以,物的特定的有序性,是在劳作过程中被激活的。一个特定的动作,是在一个特定的生产关联性当中的。从“塑形”“构序”,再到“赋型”概念,也就是给予一种“关系”。比如说一双鞋,首先通过布和皮的制作,给予它一定的外形、自然界中不存在的物质存在形式(塑形);然后,很重要的是给予它一种功能上的用在性(构序);同时会赋予它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赋型)。社会生活很核心的部分是社会关系的有序性。

整个第二卷,我用这样一些新概念,不是要让大家不懂,而是为了让马克思的生产力等概念变得非常具象。我们生命存在的核心问题,不是物性的实在。“活着”是生命的本质,是让无序的无机自然变成一种有机的生命体。我在第二卷中提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提供的重要线索就是,人在整个社会生活当中创造了一种新的有序组织方式。

张义修:刚刚您提到“给予形式”,第二卷在分析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时,也展现了马克思在使用动词“materialisieren”(物相化)时,同时用了“formieren”(形式化)“formgebend”(赋予形式)概念。在我看来,后者和“物相化”是有内在一致性的。可否这样简单理解,在马克思的语境中,劳动过程是物质的“形式化”和形式的“物质化”的统一?

张一兵:按照我的想法不能这样理解,这会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马克思可能用得比较多的是“形式化”,他有时会用带有“form”的动词来表达“给予形式”。但“给予形式”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前面我用“塑形”这个词,表示的是可见的、外部的形式。而“赋型”即“formation”,讲的是给予一种内在的、有序的组织结构。马克思对有些问题会讲得比较简单,比如价值“形式”,实际上,货币所充当的功能的复杂性,根本不是一般的“形式”概念能够容纳的,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化过程。所以给予一种“形式”(塑形)和给予一种“关系”(赋型)不是完全一致的。“物相化”包含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爱多斯实现出来,改变一个物质的形式和内部的有序性;另一个层面实际上是关系的赋型,它是一个同体的过程。

从这一点往前再跨一步,马克思在解释社会的本质、人的本质时,用的是关系的“总和”,我称之为“构式”(configurating)。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获得一种新的关系的有序性,这个有序性不是他自身的,而是他和其他人、其他物之间发生的有序关联。给予人的生活一种特定的关系质,这是《提纲》中第二重透视的核心部分,和“形式化”的意思不一样。同样是在“物相化”的过程中,这是在一个更大的关联性当中去讨论问题。在海德格尔那里,就是“此在”去“在世”,这是一个由不同的“上手”关联性或者功能关联性链接起来的“周围世界”。再往后,就到了比较复杂的形式,也就是科学中的“结构”。这个结构不是牛顿式的刚性构架,而是一个正在动态发生的过程,因此我借用了“筑模”(modeling),它不是一个静态的“东西”,而是生产过程中流动性的功能方式。用“形式化”概念很难解释后面从商品、货币到资本的极其复杂的演进过程。所以我是从“形式”到“结构”,再把这些概念融合到关于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讨论当中,就会比原来的讨论离现实生活更近一点。

张义修:通过对“物相化”过程各个环节的细化分析,第二卷在一个新的学术话语体系中,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对“物”的基本理解——不只是“物质”,更重要的是基于“物相化”过程及其塑造的复杂关系场境,透视社会生活中的事物。

张一兵:讲到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物”,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坚持自然物质的先在性。第二,在社会生活和劳动生产中被改造了的物,也是客观存在的。第三,在社会生活当中,更重要的东西不是这些物本身,而是实践、物质生产,是人和外部世界、人和人的关系。这个关系也是客观存在(第一性)的。后面我们会讲到商品经济关系,经济关系也是客观存在的。客观的经济关系被抽象出来,经过“事物化”,颠倒为事物的关系。处于颠倒关系中的事物也是客观存在的。比如,一张桌子,当然是客观存在的,而一旦作为商品,它就神秘化了,有了一种根本不是自然属性的“经济质”。这种“质”就是社会关系。我说过,社会生活在晚上是不存在的,不是说物不存在,我们躺在床上,我们的肉身都在,不存在的是社会生活本身。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不是观念决定社会生活,而是社会生活决定观念。不是“物”决定观念,而是社会生活或者“社会定在”决定观念。

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介绍20世纪30年代吴恩裕教授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提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物”不是纯粹的实在,而是处于特定生产方式中的关系体。<sup>①</sup>在理解“物”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进展非常慢。大部分人在常识层面接受不了“物不是它自身”。费尔巴哈觉得,我直观到外部自然,它是客观存在的。马克思说,没那么简单,我们今天看到的世界图景都是历史上人类劳作的产物。在自然经济和农业社会,外部自然不完全是劳作的产物。越到今天,劳作的产物越多,我们周边的生活环境、物质条件,基本是工业生产和科技发展的产物。

张义修:关于第一层级物相化的前几个环节,我认为您的论述大致可分为劳动活动物相化(塑形、构序)和社会关系物相化(赋型、构式等)两个维度。这让我想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历史原初关系的说明,也包含两个维度,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再进入人和人的关系即社会关系。一种观点认为,这里有一个逻辑上升的次序。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恰恰是马克思方法论中截然不同的两个面向。您的解读是不是更接近于强调前者作为后者基础的这样一个逻辑次序?

张一兵:这个问题很关键。关于劳动物相化,我作个解释。第一,劳动物相化是表层现象,但不是真实的基础。马克思的“实践”是客观物质过程,劳动只是这个过程的主导方面。所以,我区分了《提纲》中客观的实践物相化、《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作为实践活动“第一层级”的物质生产物相化、后来被重新凸显的劳动物相化。“劳动”为什么后来被凸显出来?当马克思解释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时,一定要回到主体的动因和发动性,回到真正创造财富的“活劳动”的部分。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是生产的物相化。

第二,“活动”和“关系”这两部分不是完全分离的。如果按照《提纲》的线索,前者是活动,后者是关系。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认的一个问题是,物质生产与再生产活动,就是人与自然的能动关系。社会存在的基础实际上是一种关系。随后马克思才说到第二个环节,就是所有人的物质生产,都一定结成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上构成了生产本身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所以马克思说,共同活动就是生产力。人的物质生产和动物不同的地方在

<sup>①</sup> 参见张一兵《论历史唯物主义的物》,《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于,它本身具有社会关系性。只要进行物质生产,就一定是社会性的,一定是在人和人的关系中发生的。所以,二者在叙述中有逻辑先后,但实际上是同时发生的。

第三,这并不否定你刚刚讲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察表现为双重向度,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在这里,马克思抽象出两个概念,一是“生产力”,这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交往关系”,这是人与人的关系。对这两者,马克思做了概括,这就是第三个环节,即“怎样生产”的“生产方式”,这是双重关系的历史结合。我从“赋型”走向“筑模”,就是想要表达马克思的这个意思,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从人现实地改变自然物质的外形、有序性,到人和人的关系形成一种组织化的有序性。所以,在社会生活这个意义上,人与人的关系,或者马克思后来说的生产关系,是社会存在最为重要的本质。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开始意识到,黑人并非天生就是奴隶,是一种外部的关系存在让他们成为奴隶。我们前面讲得比较多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物”。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一种生成性的时间性,“生产方式”的更迭是历史的本质。一定的生产力、一定的人与人的关系、一定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一定的社会存在。

张义修:您在第二卷中还提出,伴随物相化过程,人的主体自身也会发生物相化。我的理解是,“主体物相化”意味着把人首先当作“物”,然后再注入一种主体性。这里包含了主动的方面,比如说人追求自身的发展进步,从而实现自身“物相化”。但也有被动的方面,比如特定的社会关系对主体的“规训”和形态塑造。

张一兵:还有随着物质生产本身发生的主体物相化。

张义修:对。所以我觉得,您的这个提法提示我们,在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当中,主体本身经历着一个不断被塑造的过程。但是这个概念本身的内涵又很复杂,您提出这一概念的基本考虑是怎样的?

张一兵:我原来没有提到人的物相化,但在讨论的过程中发现这个方面比较重要。因为整个马克思的学说,从头到尾,生产的物相化不是目的,社会的物相化也不是目的。人类社会历史本身只有一个目的——人本身。马克思讲自由王国,最后归结为人的能力的发展、人自身的发展。马克思在他每一个时段里都关注着人自身的存在状态,他在讨论社会历史、资产阶级社会时,真正关心的是劳动阶级的贫困化和被压迫的状态。所以,关于人的主体物相化,我讲得不是特别多,但这是我一定要讲到的环节。它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一个部分是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人自身的进化和改造。这可能不是自觉的,但这是人对人自身的调节,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每个时段都有。人的生物习性也会因为生产方式的变化而改变,从远古时代到今天,人的生命过程已经很不一样。主体物相化的另一部分,也有社会制度、社会关系对人的“规训”和改变。在阶级社会中,它成为一种政治压迫。而且,越走向近现代,人的主体物相化越成为生活的中心问题。不管是对智力的投资,还是强身健体、生活质量的提高,都在这里。这个层面不能丢掉,不然就把马克思的哲学变成物的哲学了。

张义修:在第二卷下册中,您对马克思伦敦时期的论述重新作了梳理。特别是在第十一章中,您探讨了马克思从生产过程向劳动过程的视位转换,并集中分析了马克思对劳动物相化的一系列新阐述,进而分析了劳动对象化过程向机器生产的历史性转变。如何理解您在这里提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具象化深入”?

张一兵:第十一章大约十万字,源自我1999年为第二卷拟定的提纲。当时计划第一卷聚焦

主体向度,即马克思从人本主义到历史现象学的演进脉络,第二卷聚焦客体向度。我注意到,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始终存在这样一条线索,即对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的描述。从简单手工业生产到机器大生产乃至“一般智力”,这条线索是清晰的。后来在第二卷写作过程中,有了原来的提纲和文献研究的基础,再加上《伦敦笔记》中工艺学笔记与这一内容关系比较密切,因此,我决定在讨论《大纲》前专设一章阐述这部分内容。

这一章也包含了一个方法论的提示: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基础没有变。有人以为马克思到了晚年重新变成以劳动为主体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认为,马克思没有放弃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确立的物质生产的基础地位,整个这一章讨论的都是物质生产的客观进程。但马克思的任务不再是描述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个问题他已经解决了。他要面对李嘉图,去解剖机器大生产背景下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为剩余价值理论寻找依据。创造财富的现实基础始终是生产,从斯密到李嘉图,站在实证的立场上讨论生产条件和物的元素,他们的理论能自圆其说。马克思要换一个视角,从物质生产过程中凸显劳动的主体线索,追问生产中多出来的那一部分剩余价值的历史根基是什么。马克思的答案是,被掩盖起来的劳动过程。所以,这一章也为转向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做铺垫。我围绕劳动过程的几个方面,把这一线索的内容融合在这一章中,也为《大纲》中马克思转向劳动异化问题提供了逻辑转换。

张义修:在关于生产与技术的讨论中,您还提出了“科技物相化”概念。如何理解“科技物相化”同主体性的“劳动物相化”之间的关系?

张一兵:“科技物相化”和前面我们讲的实践、生产、劳动的物相化这条线索是有断裂的。前面讲的物相化都是及物性的对象性活动,而科技物相化是中介性的。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活动中,不是将意图直接对象化到物当中,这里“物相化”是在借喻意义上使用的。它实际上已经转到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和具体劳动过程的纯粹空间中,不再是基于体力劳作过程的经验抽象,而是科技人员的智力劳动实现的“塑形”和“构序”。马克思在工艺学笔记中可能意识到这一问题,我依托马克思的文本,把这一线索提炼出来。在我看来,“一般智力”被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夸大了,它是知识和观念,是“科技物相化”中的科学端,但技术设计、信息编码的智能劳动不是观念,而是塑形和构序活动。在我看来,在自动化生产之后,价值创造不再主要依靠工厂里工人的体力劳动,而是大部分源于智能劳动。提出“科技物相化”这一条线索,是为了深化对当代资本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的探讨。

张义修:以上我们探讨的“物相化”各环节主要是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一般规定,您在第二卷中称之为“第一层级的物相化”或“一般物相化”。与之不同的是,在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第二层级物相化”或“经济物相化”。怎么理解这二者的区别?

张一兵:进入《大纲》之后,一般物相化的分析不再适用了,都变成被经济学排除在外的使用价值层面的具体劳动。新的物相化过程发生在另外一个平行空间里,这里同样存在物质生产过程,但是出现了货币、资本等新的对象。在你做关于对象化概念的博士论文时,我记得跟你讨论过一个问题,在价值关系中,马克思的对象化概念和之前不是一个方向。价值关系的在场是一种反向的对象化,它不是人改变物的具象的对象化,而是一种关系反过来变成物。这使对象化变成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对于马克思历史现象学的经济物相化空间,我们很难进来。第二卷下册正是要探讨这个问题。

实际上,我对“物相化”的思考形成于下册的写作过程中,然后我又倒过去,梳理了广义历

史唯物主义的相关阐释。我借用“物相化”这个概念来说明,这是一个全新过程,但它和前面的物相化又有内在联系。在第一层级物相化中,“物”是实践活动的结果,社会生活的基础是人和人的关系。到了第二层级物相化,经济关系本身重新颠倒为“物”。这不是第一层级物相化中孙老师讲的那种最难理解的物,而是经济物相化空间中最难理解的物。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真实基础。“劳动物相化”是人的主观意图的实现,而“经济物相化”不是人的主观意图所致,如果说有一种表面的“爱多斯”,那是经济过程中资本家作为资本关系的肉身追逐剩余价值的意图,但是整个过程并没有卢卡奇所讲的那种目的设定的意图。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一句著名的话“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Sie wissen das nicht, aber sie thun es)”。<sup>①</sup>

张义修:也就是说,生产具体产品的劳动物相化,即便到机器大生产阶段也是“第一层级物相化”的表现,而“第二层级物相化”指经济关系的物相化,突出指现代商品经济关系。如果说第一层级物相化赋予物以“有用性”,第二层级物相化则赋予物以“可变卖性”。

张一兵:是的。这两个概念是第二卷中很重要的概念。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是物质生产。一直到第十一章中讨论的内容,马克思当时都是用经济学概念,比如说有用劳动、使用价值,还原到哲学的一般领域,背后还是物质生产。但是,到了商品经济关系中,使用价值要转移到另一个人手中,这就不再是直接性的关系了。从斯密到黑格尔,都没有真正解释清楚市场经济对劳动关系的具体作用。马克思在走向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过程中,第一次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

资产阶级经济学只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财富的积累,而不关心这个过程中人们的关系。马克思要讨论的基础性部分是,财富是谁创造的,为什么被拿走了,怎么拿走的?这是经济物相化空间里的全新思路。在价值这个问题的方法论思考上,马克思的观点是哲学的,而非传统经济学的。价值是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它有实体的部分,这个部分是被生产出来的。但这个被生产出来的东西不是它自身,没有商品经济及市场过程,价值根本不存在。一方面,不能简单切断劳动和交换的关系。马克思不允许交换价值离开劳动,没有劳动创造出来的可用性,就没有后面的交换价值。使用价值扬弃在价值中。另一方面,虽然我用了“物相化”这个词,但经济物相化不是生产过程,而是交换中的现实抽象。生产出的财富在交换中形成交换关系,价值本身是这个交换关系,代表了抽象的劳动者的付出。这里的劳动不是创造具体的财富,而是财富一般。桌子一成为商品,就成了头足倒置的神秘怪物。同一个东西,进入市场交换过程就发生了一种变异。这个变异实际上是关系的变异,并非实体的变化。

张义修:我在写博士论文时也发现,马克思在《大纲》里用“对象化”的时候,很多是讨论交换价值层面的问题。比如讲到货币,他会提到必要劳动时间的对象化,但这时他已经不是在使用价值的维度谈劳动对象化。也有人批评马克思把价值量解释为必要劳动时间是不成功的,因为不存在这样一个物理时间,甚至主张价值量实际上就是用货币来表现的。

张一兵:马克思在《大纲》里是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交换价值概念,后来他发现,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而已,后来他开始慢慢走向价值概念。但讲到价值量会让人有一个误解,好像在抽象劳动层面仍然有实体性的存在。我个人认为是没有的,它是一个相对的“可变卖性”的尺度关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1页。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II/6,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87, S.105.

系。但是,这个尺度关系用什么去衡量呢?一定是劳动时间,但这不是创造真实物质财富的劳动时间,而是一个抽象。我觉得马克思不会放弃劳动时间概念,他一定要从货币回到劳动本身的计量,一定要围绕劳动。必要劳动时间是李嘉图提出来的,马克思沿用了这个概念,因为他要解决一个问题,什么是货币的尺度。货币的唯一尺度来自劳动时间,是量化的抽象劳动时间。后来在讨论相对剩余价值时,也是劳动时间的缩短。总的来说,马克思的整个讨论思路是哲学的。他讲的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都不是简单的经济学概念,而是哲学概念。价值作为“对象化劳动”,意味着更重要的部分不是物本身,而是抽象劳动。这种“对象化劳动”又变成了一种关系,比如货币、资本,这些都是被掩盖了的劳动交换关系。

张义修: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劳动物相化”是指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层面。而对于“抽象劳动”,在您看来,并不存在单独的、可见的“抽象劳动”,它的本质其实是一种经济关系、劳动交换关系,所以您用“经济物相化”。

张一兵:是这个意思。我讨论劳动过程的那一章,基本上围绕使用价值。抽象劳动不会出现在生产领域当中。我说它是一个“反向”的物相化过程,就在于它实际上是在交换过程中形成的。它的前提是已经结束的物质生产或劳动活动,劳动的结果进入市场交换过程,出现了关系颠倒为物的复杂经济活动。

而且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概念内在包含了差异性。分工导致劳动活动本身的碎片化,劳动不再是每一个工人手上的具象动作,而是整合到产品中。后来的“抽象劳动”概念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但它和劳动物相化过程没有直接关联。因为政治经济学讨论的对象不是劳动物相化产生的“有用性”,而是“可变卖性”。资产阶级经济学有一种观点认为,交换价值是由需求产生的。马克思说,不对,不同的有用性之间无法产生相对关系,在交换中要有同质性的东西来进行比较。这就把劳动抽象化了,这个抽象不是劳动,而是劳动交换关系。

商品经济建立在商品交换关系的基础上,而不是效用物的基础上。这个关系在交换活动中产生,交换结束后就没有了。因此,需要一个等价物来象征它、代表它,让消失的关系能够在场。当这个物出现时,我发现,在《大纲》里马克思第一次使用“事物化”这个概念。这是不在场的关系颠倒为一个不是它自身的第三者(事物)。这就是经济物相化不同于劳动物相化之处,这是一个非实在性、颠倒的关系空间。它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般基础,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商品经济不存在了,这个经济物相化空间就全部消失了。

张义修:您在第二卷中也提到,在商品交换中人与人的关系颠倒为“事物”关系,是“经济物相化的第一层级”,这是在“—般物相化中的此—彼归基逻辑之上增加了一个……此—彼错位关系伪境”。怎么理解这种“颠倒”和“错位”?

张一兵:商品的使用价值直接表现为物本身的存在方式,它是劳动物相化所造成的,在对使用价值的透视中,将物的使用价值“归基”为劳动,还是比较容易的。在经济物相化空间中,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出发,他要说明,从商品、货币到资本,价值终究还是来自工人的劳动,但在后来的发展中,价值变成了一种异化的力量,超出劳动之外,反过来支配了劳动。商品有了交换价值,并不是物品本身被改变了,而是一种经济关系编码的结果,这种经济质性无法回到生产和劳动过程中去找到,因为它的基础是交换关系。这就超出了传统的认识论边界,从商品的交换价值开始,经济事物表现为一种新的不在场的在场性,这是马克思科学的批判认识论的起点。而且马克思不是想从物和物的关系回归到某种状态、把这种关系改善一点,而是想从根本上铲除

这种异化的经济关系。

作为经济物相化的第一层级,颠倒是从“商品”开始的。在《大纲》中,从价值形成开始,“异化”概念已经出现了,价值被抽象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和工人的具体劳动无关了。在此基础上,经济物相化的第二层级是“货币”,它是从商品交换中现实抽象出来的社会关系场境,反过来对象化在一种特定的事物中,这是不可见的价值关系的错位实体化。经济物相化的第三层级是“资本”,资本是被多重异化和颠倒遮蔽起来的对象化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关系,资本关系对象化为在场的劳动条件和人格化的资本家。

张义修:关于马克思的“事物化”以及“物化”“拜物教”概念,第二卷也做了新的梳理和分析。如何系统把握马克思围绕现代社会中的“物”形成的多重成果?

张一兵:我在《回到马克思》第一卷第三版中区分了马克思的“事物化”(Versachlichung)和“物化”(Verdinglichung)概念。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集中使用的是后者,他没有区分这两个概念。卢卡奇的书被翻译为日文时,这个词被译为“物象化”。广松涉将二者重新区分开来,将前一个词“Versachlichung”译为“物象化”,将“Verdinglichung”改译为“物化”。我将马克思的“Versachlichung”译为“事物化”,因为这个概念讲的不是主观认知中的显象,而是人和人的关系变成了事物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客观发生的现实颠倒。在第二卷中,我进一步梳理了马克思文本中的多重“事物化”颠倒,并对经济物相化、事物化等概念之间的复杂关系作了说明。

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历史现象学,就是要透视经济物相化存在论的幻境,其中包括以下多个有机构成部分。

第一,多重“事物化”(Versachlichung)颠倒:一是商品交换过程中,劳动交换关系颠倒为事物之间的关系;二是资本关系在进入生产过程时,颠倒为劳动条件;三是机器生产中发生的新型事物化颠倒;四是剩余价值在分配中颠倒为利润、地租和利息。事物化批判理论是对客观发生的社会关系颠倒的揭露和批判。由此形成的特定的经济“事物”(Sache),是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物”的核心范畴。

第二,经济拜物教批判理论。这是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幻象,将商品、货币和资本关系的事物化颠倒状态误认为“物”(Ding)本身的天然物性,以构成主观的物化(Verdinglichung)意识。在我看来,以上从事物化批判到物化批判的话语重心,都是社会关系颠倒为事物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的三大拜物教批判,针对的是经济物相化的表象层面,但并不能够涵盖马克思对现代经济物相化的全部批判。

第三,科学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这是说明工人的劳动如何成为支配他们自身的自反性力量,这种异化普遍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领域之中。这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奴役本质最重要的科学认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经济现象的理解,都紧紧抓住劳动这一基础。事物化透视构成进入劳动异化批判的入口,但劳动异化不仅是事物化颠倒的结果,也是事物化颠倒的本质。

(责任编辑:苏媚媚)